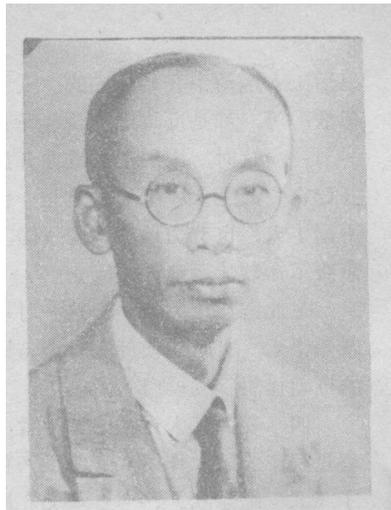


怀念叔父萧友梅先生

萧淑娴



自友梅叔父于一九四〇年故世后，音乐界不少著名人士都曾著文纪念他，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跟叔父学习过的学生和共事过的教师，都认为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待人真诚热情的好长者，办事认真负责的好工作者。今天蒙音乐界同志，聚集一堂隆重纪念这位勤勤恳恳为新音乐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的音乐家，作为他的亲属，深感党和政府以及同志们亲切的关怀。

从历史发展上看，他对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所散播的种子，几十年来，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因此，我以为今天纪念这位音乐教育家，除了由于他个人的成就值得后人纪念外，还应理解为这是总结“五四”以来这六十年间专业音乐教育的一个好机会。

下面，尽我记忆所及谈谈我对他的认识。

(一)

友梅叔父在日本留学八年(1901年—1909年)。他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毕业后入帝国大学文科学习教育；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选习钢琴及声乐。一九一三年留学德国，在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同时就读，以后又在梅林皇家大学哲学系及施特恩音乐院学习。学习的课目极为广泛，除学习钢琴、对位、赋格作曲法、配器法、指挥外，还学习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

音乐美学、音乐风格学等。由于勤奋好学，使他具有了渊博的学识。一九一六年他的《中国古代乐器考》^①博士论文由李曼(K.W.J. H. Riemann)、沃勒(Weule)和康雷第(Cornrady)三位教授主持口头答辩的。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里，他有幸直接向著名音乐理论家李曼、谢林(Schering)以及钢琴教授泰许莫来(Teichmüller)学习。

由于他有深厚广博的音乐学识，又通晓日、德、英、意、法各国文字，他对中国音乐千余年来发展缓慢的原因作了探索，并和西方音乐得以较快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现代音乐如要使之发扬光大，使之无愧于文化古国的盛名，首先必须立足于音乐教育上；建立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合格的音乐人才，师范与专业并重，有了各方面的人才，音乐艺术才能得以发展。其次，他觉得应当建立国民音乐会，组织专事演奏音乐的乐团，这不仅是为了给人民一种高尚精神娱乐，引起人民对美的重视与对音乐艺术的爱好；同时还可藉以介绍欣赏世界各国音乐，联络人类感情，借鉴西方，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来促进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与进

^① 此名称是沿用以往一般的提法，据最近见到此论文原稿上的德文标题，应译为“关于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历代管弦乐队发展的研究”——编者

步。他的关于音乐教育和发展的设想，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是相通的。为此，蔡先生对他的理想也是极力支持的。他的这些想法，反映在他发表过的文章、讲话、著作以及他和词人易韦斋先生合作的歌曲里。

友梅叔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方面的一个奠基者。他积极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主张“古今中外的音乐都要学习”。从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及女子大学音乐科到上海的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他都明确规定学生们对中西音乐都要研究学习；对民族音乐传统他主张应取不断改进的方针而反对“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自杀政策”；对教师的聘任他主张“兼容并蓄”的方针而反对狭隘的宗派偏见；在教育制度上，他主张采用西方的科学的教学体制与方法，以及“因材施教”的方针。他认为我国旧乐的精华不在于乐律理论及乐器演奏的技巧，而在于历代所积累的词章曲谱，这是我国的音乐宝藏，应该进行整理和研究。对待音乐表演，他主张中西音乐并重的方针，如他曾积极筹办我国第一个管弦乐队，努力将各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听众，同时也积极支持对传统“国乐”的演出。他的这些全面地研究中西方音乐、哲学、教育基础上所提出的种种见解，给当时的音乐界以很大影响，得到了同时代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二)

一九二〇年春，友梅叔父自德经瑞、法、意、英、美周游之后回国。当时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校长，聘他为北大讲师。同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设音乐体育专科，后因这两科的课程性质不同，学生难以适应，经他的提议，校方决定分设为各自独立的两科，

由他担任音乐科主任。一九二二年，原在北京大学附设的“音乐研究会”改组为“音乐传习所”，由蔡先生兼任所长，友梅叔父任教务主任。这两处的教学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中小学音乐师资，有发展可能的则培养为专业音乐工作者。两处的乐理、和声、作曲、音乐史等课程，他都亲自担任教学，并编写教材讲义。学员们除钢琴外都要学习一种民间乐器，学习期限一般都是四年。在校学习期间，每学期都要举行一或二次音乐会，演出节目中西乐曲都有。演唱的歌曲，大多是友梅叔父为音乐科的唱歌课谱写的歌曲。其中有二部、三部、四部合唱及各种题材的歌曲。如《卿云歌》、《华夏歌》（章太炎词）、《民本歌》（范静生词）、《“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国钧词），以及和易先生合作的，响应蔡元培先生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的《祝音乐教育中兴》、《女子体育》，反映学校生活的如《植树节》、《农计》和供学生演唱的抒情歌曲《问》、《听》、《南飞之雁语》等。记得女大音乐科还曾演出过一个用英文半说话半歌唱的小歌剧《五月花后》，有独唱、二重唱、联唱、合唱、午蹈等。由友梅叔父任午台监督。这个小歌剧的演出，颇得社会的好评。

一九二二年底，叔父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虽然人数甚少，乐器也不全。要想用这样可怜的组合去介绍西方交响乐音乐是有很大困难的。然而友梅叔父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在北大三院小礼堂每年举行四、五次交响音乐会，给广大师生介绍了海登、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格里格等著名作曲家的交响音乐。这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记得当时哈尔滨的一位俄籍歌剧团乐队指挥来京听了这个小管弦乐队的演出，认为有发展前途，很愿意前来协助演出些俄国作曲家作品。友梅叔父为

此曾一再向当时北京政府请求拨款资助扩充乐队组合的计划，但终因得不到经费的支持而只得作罢。

一九二六年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组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增设了音乐、戏剧两科，校长林风眠先生聘请叔父担任音乐科主任。在叔父已身兼两处的行政、教学之外又要兼“艺专”的行政及教学。他以惊人的坚强毅力，出色的组织才能，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艺专音乐科的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伟大的革命音乐家的冼星海同志。

不幸的是那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重视艺术教育，饬令将北京的音乐教育机构一律停办。他惨淡经营用心血浇灌的这些音乐教育之苗终于横遭夭折。在这种令人伤心的形势下，幸而得到了解他抱负、这时正在南京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在上海终于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院，由蔡先生自兼院长，叔父担任教务主任。这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史上第一个独立于其他科系的专门学习音乐的机构，为我国音乐史写下了新的一页。这所学校虽然初期规模很小，建院开办费也极为拮据，开学时的学生只有二十三人。但在纷乱局势之中竟能成立一所音乐院，这实在是友梅叔父的一大劳绩。当时正值一九二七年，他正四十三岁，开始了他献身音乐教育事业的一个最快意最富创造力的新阶段。

(三)

我所熟悉的二十年代的友梅叔父同他后来去上海之后的形象是很不相同的。在我的记忆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北京担任音乐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中学就读，以后入女大音乐科。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勤”和“恒”。他在音乐传习所和女高师两处执教，奔走于石驸马大街和皇城根北大三院之间（当时北京城内交通只有很短的有

轨电车和黄包车）。叔父每天要教课、排练、写作，事务也不少，工作是很繁重的。然而他以惊人的毅力承担着。而且每天还挤出一些时间练习钢琴和舞剑、打太极拳等。当时我们家里有五、六个女青少年学习钢琴，一架琴轮着班去练习，开始都是叔父亲自教我们的。为了教学之用，他和易韦斋合作写下的近百首新歌，常常让家中我们这些女青年先给他试唱，他亲自弹钢琴伴奏。那时我们家里是琴声不断、歌声飘扬的。

第二是他的“勇”。前面说过他担任两处教学、写作、排练乐队等等工作，若没有勇于任事、有恒不懈的精神，是难以胜任的。何况他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偏弱，承担那么多工作，劳累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勇”，更重要是表现为为人正直严肃、谨慎多思、公私分明、不徇私情的品德，凡是和他共事过、从他学习过的人都是公认和敬佩的。他仁慈忠厚，爱护学生，对经济有困难者，则设法帮助他寻找抄写工作，或亲自资助，帮他们渡过困难。对离家路远寒暑假回不了家的学生，有的还常招待在家里。

叔父是很喜欢社交的。记得他常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邀请北大、清华、女大的教授们（有时是学校的同事、学生）到家里来茶叙，有时还举行些余兴，如唱歌、朗诵诗歌，和朋友们一起渡过一个愉快的茶会，藉以舒缓一周来工作学习的紧张情绪。这种和学生、朋友们一起茶叙联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学术界很流行的风尚。

在个人感情生活方面，我们家属知道他在二十年代期间，曾经爱过他的一位学生，但结果不如意，他曾为此非常难过。以后他便以加倍努力于音乐事业的教学、写作、演出等活动来寄托他的感情。直到一九三二年（四十八岁）才在上海和戚粹真女士结婚。粹真婶母曾在幼稚园担任校长，是位很有才华的女子，她笃信基督教，而叔父则是个无

